

【書評】 Book Review

林志宏：
《民國乃敵國也：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》
(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2009年)

區志堅*

易代之際，前朝遺留下來而不仕新朝的社群，稱為「遺民」，他們多表達對故國舊君的眷戀，選取隱居或參與反抗新朝的活動。歷來較多學者注意元、明遺民表達忠貞前朝、對抗外族的漢人思想及行為，較少研究清遺民。其實，清遺民的社群包括：漢人及非漢人；非漢人的社群主要是滿洲人，滿族遺民忠貞對象自是清政權，但漢人仍然忠於這個非漢族建立的政權，而不是由漢人建立的民國政府，這樣漢族清遺民的種族立場及政治道德就更值得研究。更重要的是，忠清的遺民不獨面對朝代的鼎革，還要面對民國建元，數千年來「普遍皇權」(universal kingship)的瓦解，中國傳統社會及政治秩序走向民主共和的政體，遺民身分上自「臣民」被迫成為「國民」的問題，他們秉承傳統儒家政治文化，怎樣面對晚清民初變法、革命及五四新文化運動後，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學術文化的轉變？不少遺民更參與導致中國割地賠款、「喪權辱國」的列強政權，他們的政治及民族認同怎樣從傳統華夷之辨轉化為「用夷變夏」？可見清遺民的思想、心態及行為，均較元、明遺民更為複雜。若把清遺民放還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從帝制走向共和及現代化進程，更見政治文化轉型下，不同社群的政治認同問題，「忠誠」等傳統價值觀在與現代社會的改變，及傳統文化在中國走向民族國家的變化情況。前人多視清遺民為「保守」、「落後」

*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高級講師。

及「多染阿芙蓉癖」(吸鴉片)的社群。自八十年代,才注意清遺民研究,先後有胡平生、陳豪滿、林毓生、竹內弘行、栗林幸雄、葉嘉瑩、周明之、黃興濤、熊月之、吳志鏗、彭海鈴等。近日林志宏運用新文化研究方法,宏觀地從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文化轉型及思想文化層面,研究清遺民的生活及政治認同,並撰成《民國乃敵國也: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》一書,檢視清遺民群體及生活文化的多元化面貌,又能澄清世紀之交「當中個體/集體的心理傾向,都將有助進行更深刻地反思。〔……〕那些被視為『負面』而忠誠清室的遺民,身處轉型時代之際,他們看似違背主流價值、卻又兼具理性和感性的政治抉擇,亦能幫助我們檢視對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文化轉變的過程」(頁363),也可見「從帝國邁向現代國家的道路上,人們處於種種難以適應現實的心境」(頁364)。

此書除了導論及結論外,共有七章,並有附錄。以下介紹此書的特色。作者成功運用政治文化的研究角度,突破「革命史觀」及「五四型新文化史觀」的偏失,推動清遺民的研究領域,注意研究人物心態轉變與時代政治發展的關係。昔日因不少學者視「革命」及「五四運動」標舉推倒舊文化及破壞帝制的行動為「正」面,發表反對這兩方面聲音的人物視為「負」面,由是忽略了很多研究領域。作者運用近年倡導「政治文化」(political culture)的研究方法,從「心理層面,探討個人與政治體制間互動關係的知識,企圖自個人的認知、情感、態度和行動等各種角度,考察並解釋政治體制本身的穩定和變化」(頁19)。因為遺民自知「文本」為公開發表的言論,甚至會出現隱諱,閱讀這些「文本」,未必全然了解著者的內心世界,故林氏突破「文本」的限制,從「文本」探討其意象及文化含義,注意人物的歷史記憶、制度、服飾、持守的儀節、發表的書畫及感情世界等文化象徵符號,結合著者的日記資料,探討人們的私生活及內心世界,深入研究遺民藉對過去的認知,以肯定當下的身分認同及表現行為的依據,也注意遺民認知、情感世界與時代政治、社會文化的互動關係。

昔日學者多認為辛亥革命以後,社會趨向進步,然而林氏已指出「認定帝制與共和係屬兩種不同性質的政治和文化,然而在兩者轉型之際,許多人由於短時間無法適應,出現政治生活的矛盾及不和諧」(頁22),清

遺民的心態可以呈現近代中國政治轉型中，民初人們並未認知民主及共和的意思，這是一種在走向共和體制下的「不完整的政治文化型態」（頁22）。同時，作者在堅實資料下，藉宏觀及人物個案研究，清楚指出研究遺民的政治主張，不獨注意他們的言論，更要注意他們表現的文化活動的意義，及時人對遺民的評價形塑遺民的身分，引證了林氏所言「要談論清末民初的文化思想課題，政治其實還是無可逃避且須面對的一環」。

作者運用政治文化研究方法，重新檢視「清遺民」群體的意義及心態。前人以「清遺民」一詞，指稱那些積極參加民初復辟運動、深懷故國、自我形塑忠誠的身分認同、隱居不仕民國政府的人士。林氏認為此觀點不太準確，因民初大一統的國家模式已瓦解，中國走向民族國家的道路，遺老已不從「忠君」及忠於「前朝」作出仕隱的抉擇；有些具有維新思想的遺民，更不認為清亡及民國建立是重要事情，故應多注意遺民心態及與政治發展的關係，清遺民是對清要忠誠，也要反對民國的政治體制，心態上不接納民主共和的政治理念；更重要的是，作者指出時人如錢玄同等，也指稱贊同傳統學問的舊學人士為遺老或遺民，學者不獨要注意遺民自我身分的認同，也要注意社會輿論對遺民社群形象的「形塑的評價和變化」（頁29）。換言之，遺民的價值觀就是一種社會群體的共識及表象，「清遺民」也是一個多元含義的概念。

作者首次從地理上劃分清遺民的活動範圍，開拓遺民區域研究的先河。遺民因溥儀居紫禁城，可以即時謁見，又可以尋求故友支持復辟，故選居北京、天津，他們的心態也是不滿共和，多傾向恢復帝制，也有出仕民國政府，待時復國，林氏指出「身在京津地區遺民的人際關係，非可全以政治的態度為分野。也就是說，他們過往密切的友朋當中，不乏出仕民國的舊官僚」（頁41）。青島為德國租借地，居此地的遺民多是清室重要遺臣，他們在此地接受異國政治庇護，既可逃往海外，又可與故友交往。遺民因上海為列強租界區域，較為安全，又因當地富商、出版商資助，生活也較優裕。

林氏也研究居廣東及港澳的遺民，此點應為讀者多加注意。廣東素視為「革命」及「新文化」發源地，較少注意其保存傳統文化的特色。林氏

指出「這區域亦存有極『頑固』的保守樣貌」(頁57),廣東遺民多受清中葉東塾學派及學海堂遺風的影響,他們多取宋、明遺民的史事為歷史記憶,「發明」過去史事強化當下遺民身分認同,又積極參與地方政府編撰方志和教學工作,卻不直接參與政治復辟行動。他們既因廣東及港澳較北方安定,又受當地華商所器重。也有遺民亡命日本,他們多因中國戰亂及經濟困拮而選居此地。

作者談及遺民的出處問題,甚有卓見。前人論歷代遺民出處,多只注意遺民們自述詩文,但林氏除了注意詩文外,更運用「儀式」的文化學研究方法,注意遺民參與儀式的社會象徵符號。譬如遺民不棄髮辮,多穿清朝衣冠主持儀禮,在書畫上多署前朝官名或不書民國年月,也發表反對陽曆、緬懷陰曆的言論,主要藉此「標榜自我的政治認同」(頁83)。

作者藉研究遺民的私生活,以見其認同清朝的政治態度。有些遺民參加清室公開舉辦祭典,卻未必發表其支持清室言論,但遺民撰寫的日記內,可見他們參加慈禧祭典、祝賀溥儀大婚等儀式,參與京劇表演後,多呈現對故國思念。林氏又注意部分遺老雖厭惡這位曾為清朝的官僚、後任大民國總統的袁世凱,卻寄望袁氏保存清室的地位,故在革命黨人與袁氏之間,只可選擇支持袁氏政權,但也有遺民借助革命黨力量抗袁氏,藉此求復辟,故林氏說:「反對袁世凱主政,實在難以做為釐清遺民們對政治的考慮與認同」(頁116),遺民主觀傾向帝制的心意,只有在「私密的史料裡,才會透露同情袁氏的想法與作為」。林氏也指出遺老面對民初政治紛亂,對袁氏政權失望,又求復帝制及表達忠清的心態,故主張親德國的外交政策及支持張勳復辟,但也有遺民主張「虛君共和」,有些遺民主張不可共和,由是作者指出遺民「認同模糊」,並認為「如果只把遺民的政治認同,視作與民國對立而絕不可逾越的界線,不加以考察其中人事複雜的關係,則似乎過分簡化了他們出處的課題」(頁127)。遺民為表示忠誠及認同清室,只可參與洪憲帝制、張勳復辟,但復辟失敗,終放棄籠絡軍閥,卻又面對民國政府壓迫,故只可藉出仕滿洲國實踐其政治認同,他們的抉擇正是林氏所言:「儘管個人出處的角色係由自我界定,可是社會的賦予卻又超出原先個人的設想以外」(頁129)。

既然清遺民的自我認同十分重要，遺民多以詩文書寫身分認同，這些文字不獨是文化層面的表述，也是政治實踐的工具。林氏以編修《清史稿》的事情為例，說明遺民維護清室的歷史記憶，以及形塑了遺民身分認同；如《史稿》內既稱「史臣」，部分遺民曾反對《清史稿》立「興學志」，以示興學是革命之原。此書也談及「遺民敘事」體裁，遺民整理歷代遺民傳記，取歷史記憶以支持當下的遺民身分。林氏以廣東遺民汪兆鏞編撰《元廣東遺民錄》、《碑傳集三編》為例，說明遺民「發明」過去的歷史及表述前朝遺民史事，以見遺民主張應泯去滿漢之別，求潔身自愛及扶持綱常倫理秩序為己任，清室是社會恢復秩序的代表，汪氏蒐集所選取的史事及人物就是「將政治理念由隱諱的歷史著作來發表衷心」（頁176），「以事存人」達到「緬懷現今」（頁159）的目的。另外，部分遺民雖反對參與民國政府主持編方志的行動，但也有不少遺民藉編志書以存地方文獻，以喻遺民認同忠清的身分，有些遺民藉此以「揭袁世凱的面目」。

前人多認為民國建元後，遺民發表的忠清言論是「落後」，林氏指出這論點是不了解遺民所處歷史環境。遺民生於晚清，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重要階段，表面上，他們的言論只是思想文化史的領域，其實是與清亡有關，遺民面對民初舊帝制瓦解，共和制未立的混亂情況，故希望復辟以回復帝制的常態。林氏注意清遺民表述五代史事的敘事策略，遺民認為清亡、軍閥混戰、五四時攻擊傳統文化的言論代表綱常毀裂、廉恥淪落及社會動亂，猶如五代之象，所謂「五代式民國」，只有恢復倫常載體的經學及孔子地位，社會才可大治，故多支持讀經及參加倡立孔教的活動，以宗教強化倫理價值。有些遺民更認為立孔教復綱常，綱常立便擁舊君，由是在提倡新文化及反對復辟者的眼中，把復辟、孔教及清遺民的言論連成一體，既攻擊傳統文化及孔子，又批評遺民的言行。

作者除了注意清遺民自我認同的主體外，更研究民初社會言論形塑遺民的觀點，讀者可以更客觀地了解從民初政治及學術的變動，把傳統視為「蜷懷故國故君、深具節操」的「遺民」，轉變為「負面」的形象，促成這種轉變就是林氏所言「社會集體創造和實踐的結果，來自不同場合、動機，甚至是說服群眾的管道」（頁226）。書中以康有為涉及「盜經事件」

為例，說明康氏為遺民代表，民初輿論批評康氏的人格之餘，帶動貶低遺民群體的地位。又在一九二四年發生溥儀出宮的事件，昔日視皇家藏品為「維繫遜帝的政治定位和圖騰，亦即統治正當性所在」（頁253），以及後民國政府要求溥儀出宮，接收宮禁，遺民大表反對，但提倡新文化的知識分子，認為溥儀不出宮代表了民國放了一位復辟而保存舊道德的皇帝，把遺民聯繫上民國復辟現象，指斥遺民不認同民國體制，把遺民視為「廢物」，使「遺老」、「遺民」成為「負面」形象；又隨民眾參觀了皇宮景點，昔日神祕的皇帝生活被「去神聖化」（頁247），皇宮成為「故宮」，藉「儀式本身亦說明有意終結清室」。隨著民國政府地位確立，反對帝制和接受新式學問的知識分子佔領學術界的領導地位，這群曾發表反對迫宮言論的遺民，再一次受到社會輿論「污名」，遺民地位更為低落。

林氏運用文化學的研究方法，重新闡發舊課題的研究意義。前人多從文化、政治角度研究王國維之死因，林氏指出：遺民金梁認為，王氏自沉，既表現道德高尚行為，也表達忠君的政治思想，這樣「道德政治化」的用意是「成為一項政治符號，讓他們可以藉此來鼓吹忠節，甚至成為標榜高尚道德的闡釋架構」（頁304）。當時學者如顧頡剛已從學術的角度，指出王氏為追求學術，不是表達忠節及忠清而自沉。王氏的老師羅振玉早年憶述王氏的文字，多表述其與清室的關係，後期改為強化其關心中國未來及具有科學的治學精神；陳寅恪則從學術的角度，肯定王氏的學術成就，藉此二例，已知民國學界要求建立一個「學術社會」去政治化的風氣，由此也成功引證林氏所說：「『道德政治化』在民國以後的沒落，至少說明在政治取向裡，道德已經失去了它本來的光芒。新的知識分子不再將追求崇高的道德價值和政治串聯一起，『士』的理想似乎也將終告結束」（頁305），這樣便衝擊遺民代表崇高道德理想的社會地位。作者一再提醒讀者：「過去我們在探求這些史料的真相時，往往忽略資料本身之間的差異性；若是無視於這些文本彼此間些微的不同，或許將難以得到其中弦外之音」（頁303），若不比較羅氏的言論前後有異，也未必可見民國學術典範的變異情形。

作者也從情感與政治互動的關係，探討遺民參與「滿洲國」的問題。自抗戰以還，前人在全面肯定抗日是「正義」的論調下，不注意研究日人

扶植下滿洲國的運作，近年學者才多談及滿洲國的現代性問題，但尚未注意為「中華民族」的遺民，面對背上「分裂國家」的罪名，卻出仕滿洲國，遺民們的政治認同及情感是怎樣的？作者從國際視野，展示三十年代，國際恐共思想熱烈，遺民陳曾矩等警覺赤化，不少富有遺民曾受到共產黨徒迫害，多認為只有孔教才可對抗赤化，既恐共，民國政府又不可憑依，故遺民雖知日人以滿洲國行「以華制華」，仍認為此是復辟時機，部分遺民更欲「以夷制華」抗民國政府及共產思想，「即從反對民國的角度審視，滿洲立國某方面亦屬清遺民對政治認同和抵制的一項體現」（頁356）。作者以後人詬病甚多的清遺民鄭孝胥出仕滿洲國為例，說明遺民支持此政權有其深層心意，不可簡單視作「賣國」行為。鄭氏欲滿洲國如意大利一樣，建立一個具有宗教信仰的政權，把溥儀與日本昭和天皇並列，奉溥儀為帶給世界和平的「賢君」，只要恢復中國傳統王道統治，世界便和平。正值三十年代，日人宣傳「王道樂土」的統治理念，契合鄭氏以中國禮治、孔孟思想，為團結東方民族抗衡西方強權及文化入侵的理念。換言之，鄭氏倡導的王道精神是「披著傳統『思想資源』的外衣，以『概念工具』的形式，夾雜現代化武力為後盾。站在遺民的立場，希望重新詮釋傳統，目的為了塑造『中華世界秩序』」。 (頁359) 王道思想既成為恢復帝制的理論基礎，又是解決道德淪喪的良方，滿洲國「以皇帝為政治之本位，以孔子為文化之本位」，享有道統與治統合法管治的地位。由是可見，林氏以同情諒解的角度，重新闡述鄭氏「在痛苦煎熬和希望掙扎之間的擺盪」（頁358），以及遺民「究竟如何在文化主義和民族主義兩者間做出抉擇」（頁374）。

雖然作者研究屢有創獲，但近日新出版的研究成果，可以補足林氏的觀點。秦燕春《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》¹一書，已說明清末民初革命黨員、南社成員與遺民以不同觀點表述晚明史事的情況。有關民初遺老及蒙藏王公的經濟收入苦況，亦可見章猷才《民國初年社會結構論稿》²一書；讀者

1 秦燕春：《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9年）。

2 章猷才：《民國初年社會結構論稿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9年）。

可以從近日出版《溥儀日記》³中，可以補足此書所述溥儀對遺民的看法及鄭孝胥在宮中生活的情貌。

至於論點及研究範圍方面，讀者尚可以注意以下地方：一、讀者可以多注意研究居留香港的清遺民。遺民住在上海等地的租界，尚可謂居於中國國境，如今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，遠離中國，但遺民任教香港大學，協助港大中文學院籌款，部分遺民又任「夷人」港督的老師，他們身分認同為清遺民，又欲把香港成為「海濱鄒魯」，他們表示對清忠誠，又欣賞港英政府，有時又與國民黨黨元老鄒魯聯絡，相信未必可以簡單地用「與殖民地政府合作」（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）或「事仇民族主義」（Collaborationist nationalism）、「文化遺民」（Cultural Loyalist）等概念指稱他們的行為，而要多注意他們的複雜心態，近日廣東省文史資料委員會編《香海傳薪錄：香港學海書樓紀實》⁴一書，概括居港清遺民的活動情況。二、清廣東宣撫使梁鼎芬、翰林桂沾太史等擔任廣東民國政府主持廣東修志活動的總纂、監修的職位，廣東素視為「革命策源地」，遺民理應與廣東民國政府劃清界線，但他們卻參與這政權，究竟他們的心態如何？肖自力在《陳濟棠》⁵一書，指出不少清遺民支持廣東軍閥陳濟棠籌劃「廣東復古運動」，遺民們的心態又是怎樣？三、周薇在《傳統詩學的轉型：陳衍人文主義詩學研究》⁶一書，指出上海遺老陳衍曾說：「余不主張『遺老』二字，謂一人有一人自立之地位，老則老耳，何遺之有」，陳氏也不認同遺老的身分，那樣今天有些學者把陳衍，與陳三立、沈曾植均視為遺民，是否可以再思考他們之別；同時，讀者可在林氏提出研究遺民應注意遺民的主體身分認同及外在輿論「形塑」遺民的觀點外，尚可研究那些主體不認同遺民身分，卻為外界認同為「遺民」的人物，他們的政治認同又如何？四、讀者也可注意列強及海外華僑對遺民的態度，日本政府對遺民的態度自不待言，張勳失敗逃入荷蘭使館，遺民萬繩棊避入法國使館，駐

3 愛新覺羅·溥儀：《溥儀日記》（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09年）。

4 廣東省文史資料委員會（編）：《香海傳薪錄：香港學海書樓紀實》（北京：中國文史出版社，2008年）。

5 肖自力：《陳濟棠》（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02年）。

6 周薇：《傳統詩學的轉型：陳衍人文主義詩學研究》（上海：上海三聯書店，2006年）。

華公使團首席代表、英國公使朱爾典（Sir John Jordan）決定給張氏保護，西人莊士敦（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）、李佳白（Gilbert Reid）支持溥儀及遺民，這些洋人對遺民的觀感又如何？還有，海外華商如香港中華總商會、大阪中華總商會、上海旅滬華商維持會等，多在經濟上支持遺民，海外華商的際遇及政治認同與遺民有哪些相同地方？五、清遺民江孔殷太史喜蛇宴，今天流行的「太史蛇羹」就是他曾盛宴朋友的食物，相傳不少遺民也喜美食佳餚，讀者可以多注意研究遺民的飲食文化，他們的品味可視為一種身分象徵。陳振濂在〈民國書法史論〉⁷中，提出「遺老群書法」的概念，盛稱遺民沈曾植、羅振玉的書法，今後可以多從書法藝術的角度，研究遺民書畫與身分認同的關係。

誠然，林氏已成功運用清遺民的個案，說明中國在二十世紀時如何從帝王邁向民族國家的歷程，不同知識分子群體的精神、思想及生活形態面對那些困難及轉變，呈現生活的多樣性，引證了林氏所說「在現實生存狀態下所形成的認同，毋寧也是以『複數的型態』來呈現的」（頁366），遺民認同問題非是某人或獨特價值聯繫，而是由獨特歷史背景，構成遺民主體及集體內在精神是多面體的特色。最後，本書「附錄：清遺民基本資料表」中羅列二百六十七位遺民的生卒、籍貫、任官經歷、辛亥後動向，對日後研究甚有貢獻。結合作者參考的資料，已見林氏成功地運用新文化研究方法，廣泛蒐集很多未刊日記及詩文集，發微遺民的私人場域、內心世界，及其與外在環境的互動關係。深信此書是作者研究清遺民的第一步成果，日後將對個別遺民及區域遺民作微觀的研究，也相信此書成為研究清遺民的必要參考書，期待作者由研究清遺民擴至歷代遺民，並確立遺民史學的研究領域。

7 陳振濂：〈民國書法史論〉，《書法研究》，1993年第2期（1993年），頁56-90。